

第三章 左翼思想的開展及台共的成立

台灣在經歷武裝反日失敗後，隨即開展以右派抗爭為主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由於右派運動隨著組織發展而產生思想分歧，而抗爭主要的訴求又未能獲得日本政府的積極回應，甚至右派團體的某些成員和日本當政者更存著曖昧不明的利益庇護關係¹，右派所成立的文化協會因而分裂，訴求抗爭更直接的成員重新調整抗爭組織的領導思想及更激進的運動方向。

而左右此段時期台灣政治團體的思潮即是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傳入，社會主義及共產思想之所以能夠介紹到台灣來，全然是經過留學生的管道。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日本正處於大正時期，而中國也在國共合作時期，基本上兩地對左翼思想都採取寬容的政策。而在這一章節中，也將對台灣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做一介紹，除了探討台灣共產黨的崛起背景，也對於台共派系嚴重鬥爭的因素進行探究，分析派系在政治路線上的分歧；而此段時期的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更是台灣抗爭史上的新頁，人民百姓因為自身的痛苦與殖民政府抗爭，「二林事件」更是具有台灣農民運動的關鍵意義。

在討論左翼政治團體時，不可避免要追尋到文化協會分裂的情形，文化會的兩次分裂，左翼青年都成功的驅逐了右翼人士，使文化協會成為其宣傳共產思想有利工具。同樣地，文化協會中兩位關鍵人物—連溫卿、蔣渭水，尤其是蔣渭水從三民主義的代表者到臨終前成為左翼思想的擁護者，其政治立場的轉變，更是研究此段歷史的研究者最感興趣之處。

¹在第五次的議會請願運動時，辜顯榮等人在同時召開「有力者大會」，出席幹部 27 人，包括洪以南、簡朗山、林榮初、陳中和的代表陳啓峰等人，他們宣稱：「本島一部少數者，不滿足於台灣文化現狀，妄為空想所趨，每於帝國議會開會時，作台灣議會設置之請願。……已惑人心，甚有破禁而觸法者，彼等趕行如此之不純行為，不但為本島前途擔憂，實為吾人所最憾之處。」，公然抵制請願運動，幸而林獻堂率領文協幹部召開「全島無力者大會」，發是要撲滅「偽造輿論、蹂躪正義的自稱有力者」；另林獻堂成為右派運動的領導後發起議會請願運動，日本總督便時時「勸導」林停止請願運動，1929 年 9 月 29 日當時的常吉知事引見林獻堂、楊吉臣等八人見田健治郎總督，由總督勸導林停止請願；同時，台灣銀行又向林獻堂逼討二十多萬元的債務，加上同年八月間，北白川宮的紀念碑上「王」字被毀損，警方宣布士林獻堂的族人所幹，都一一對他造成莫大的精神壓力。林獻堂等人後退出請願運動，被後人諷刺為「八駿馬」，更把林、楊等人的妥協寫成〈犬羊禍〉小說(犬是「獻」字偏旁，羊即「楊」字同音)，引自楊碧川：1996，116。

第一節 無產階級社會運動的發展

一、 台灣左派思想的興起

(一) 受左翼思潮影響的台灣留學生

1. 大正時代思潮－

根據盧修一、簡炯仁和張炎憲等學者的研究，共產主義運動進入台灣的途徑，除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到影響，在中國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吸收，也影響了台共。日本左翼思潮時期應追溯到1921年前後來檢視。1921年，日本內地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曾建立聯合陣線，但隨者共產主義的興盛，兩者於同年六月決裂，展開了所謂安那其²／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此時，與共產主義人物交往的留學生中有逐漸受其影響者。大正民主時代的民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衝擊著在日本的留學生及中國留學的台灣人學生，加上時代所反映的各種運動，使得第一代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知識份子熱血沸騰，投入殖民地反地運動的大行列。³

2. 中國五四運動－

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於6月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因受蘇聯革命的影響而左傾，1920年5、6月間，第三國際遠東代表派駐中國。同年八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組成。以學生、知識份子為中心的上述諸運動，對於台灣人留學生也產生顯著的影響。在此同時，留學中國的台灣留學生翁澤生、蔡孝乾等在瞿秋白的影響之下，也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研究共產主義，且逐漸推展活動回台灣，使得台灣共產主義的活動得以形成。（盧修一，1989：31-46）

(二) 留學生組成的共產主義組織

² 「安那其」是指無政府主義的語譯，安那其（出自希臘字母 an 和 arche，意為權威之反面），這個名字定義了一種生活和行為原則或者理論。按照這個原則組成的社會里，政府不存在，社會整體和諧的獲得並不依賴人民對法規的臣服和權威之服從，而是以生產和消費為宗旨，同時也以滿足每個文明存在個體無限廣泛的需要和追求為依歸，由不同地域不同職業的人自發組織起來的各個團體間自由商定來達成。

³ 1926年日本社會主義人民黨與日本農工黨相繼成立，遭禁的日本共產黨也在日本工人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合作下，重建起來，此後日本共產主義運動吸引了許多留日台灣學生。例如連溫卿就是透過山口小靜而認識日共著名的領導者山川均，山川均也根據連溫卿提供有關台灣的資料，撰文嚴厲批評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措施，此後，連溫卿就致力於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參閱簡炯仁：1997，49。

1. 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

當 1919 年列寧創設「第三共產國際」之後，開始支援世界各地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台灣留學生范本梁、許乃昌、謝文達、連溫卿、林木順、雪紅相繼參與學習。許乃昌於 1926 年在東京成立「台灣新文化學會」，擬在「東京青年會」內擴張共產主義組織。「社會科學研究部」初期為秘密性質，藉「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掩護擴張勢力。到 1927 年「台灣青年會」左右兩派對立浮現，11 月幹部改選中，左派的「社會科學研究部」成員取得主導權，造成右派幹部沈榮、楊肇嘉…等退場，而「東京青年會」則轉由「社會科學研究部」的左派成所佔。這是台灣左翼共產主義運動在海外知識團體中發展組織的前導，其後也對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成立有所影響。

2. 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

由於日本政府在 1928 年大舉突擊共產黨組織，許乃昌等台灣青年會科學研究部成員為圖發展，乃發表《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獨立宣言》，於當年 5 月將「會科學研究會」改稱為「台灣學術研究會」，由甫自上海參加「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台灣共產黨」創立大會回到東京的陳來旺所指導。會員包括蘇新、何火炎、蕭來福…，他們接受「第三國際」及「日本共產黨」的支援，擴展在日的台灣人組織，並派林兌返台支援「台灣農民組合」運動。

二、 台灣島內的共產主義運動

1923 年 7 月，蔣渭水、石煥長、蔡式毅、連溫卿、謝文達等在台北大稻埕發起「社會問題研究會」，雖經日警阻撓被處以罰款，但島內有關社革命思想的討論以暗地傳播。同年 8 月，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擬再組「台北青年會」，同樣被依治安警察法禁止，最好只好秘密成立「台北青年體育會」。翁澤生、潘欽信…等則在淡水成立「台北青年讀書會」，他們共同在文化協會的旗幟下，藉合法的公開活動，從事有關社會革命理論與組織的秘密工作。1924 年至 1925 年間，這二個會的積極份子先後以「台北無產青年」的名義進行演講，並伺機宣揚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以致被日警取締，造成翁澤生及洪朝宗被捕判刑。但從此凝聚成台北無產青年派，他們在各地聯繫民眾，開展批判殖民統治政策及社會革命運動，一方面也與文協內部從事台灣議會請願的人士

逐漸區隔，走向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路線。

在台灣共產主義擴散過程中，最值得重視的現象是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左傾，1927年出現「中國改造論」的論爭，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路線戰勝了民族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協會的立場轉變，以階級鬥爭作為新文協的思想路線。而以下也會介紹農組左傾的過程。1920年文協與農組左傾的論述，部分反映出1920年後社會運動的趨勢，形勢上提供了台灣左翼共產主義勢力得以發軔的條件，但也能發現日治時期台灣左翼運動再發展路線上面臨分歧的事實。

三、日共台灣民族支部的成立與沒落

(一) 台共上海成立大會

第三國際於1927年4月中旬開始，前後數次聽取由福本和夫等人所作有關日本諸情況，及所謂福本主義指導理論的報告。7月15日於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中，由布哈林起草的「有關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被提出，經決議通過，由日本共產黨採用為黨之綱領。該綱領即所謂的1927綱領，在綱領中提出「殖民地完全獨立」的主張，並規定「日共應對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保持密切的聯繫，在思想上、組織上給予支援」。⁴

當時台灣青年林木順及謝雪紅經第三國際安排接受日本共產黨指導，並接受將台灣共產主義運動進行於實踐之指令而返歸上海，至上海後，謝與翁澤生聯絡，預計集合左翼青年組成「上海台灣讀書會」，進行發展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工作，並由「讀書會」吸收成立民族支部的新同志。1928年4月5日，台共在上海法國租界內的一間照相店舉行黨成立大會。會中中共代表彭榮⁵對於台共綱領提出多意見⁶，雖被謝雪紅反對，但彭榮的意見還是被大所批准而

⁴ 若林正文，《蓬萊島》雙月刊，第27、28、29期，1975年5月、7月、9月。）

⁵ 有關彭榮的身份至今仍是一個謎。許世楷在其博士論文中，認為彭榮就是中共的領導人彭湃，一位農民運動領袖。參閱許世楷：1973，328。簡炯仁在其台共研究的碩士論文中考證，也認為彭榮就是彭湃，見 Chiung-Jen Chie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aiwan, 1928-1931*,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頁 174-177，在所有中共的紀錄中，唯一把彭派與台共連在一起的，是李稚甫的：1995，145。他說：「中國共產黨優秀的領導者之一——彭湃同志，就曾與台灣共產黨取得密切聯繫。」不過，李稚甫並未指出彭湃就是彭榮。

⁶ 彭湃以一篇有關台灣歷史的演說作了大會的開場白，該演說回應了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當他談到中國農民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有極大的進步時，它開始猛烈批判諸中共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並嚴厲譴責前年國民黨對中共的「清黨行動」。他提醒台灣同志一定要引此次「清黨行動」為鑑，時時警惕，非共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對革命的虛情假意；彭湃也針對渡邊的上海綱領提出一番自己的看法，並要求政治綱領必須要進一步加以澄

併入綱領修正案。三天後，林木順、謝雪紅及翁澤生等三人召開民族支部第一次委員會，會中，三人決定如下的權責分配：

表 3-1 民族支部成立大會的代表名單

彭湃	中國共產黨代表，代表第三國際
呂運亨	朝鮮共產黨代表
謝雪紅	建黨籌備委員暨大會主席
林木順	建黨籌備委員
翁澤生	建黨籌備委員
林日高	台灣激進團體代表
潘欽信	廈門台灣學生寄進團體代表
陳來旺	東京台灣學生寄進團體代表
張茂良	上海台灣學生寄進團體代表

*資料來源：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史〉卷 2，590 頁，2005 年；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祕史〉，頁 5，台北：海峽學術，1980 年。

表 3-2 民族支部職務分配表

(a) 中央委員常任委員 林木順、林日高、蔡孝乾	
(b) 中央委員	
林木順	書記長組織部部長
林日高	負責婦女部
	負責宣傳部 (缺席)
莊春火	負責青年部 (缺席)
洪朝宗	負責農民運動 (缺席)
(c) 候補中央委員	
翁澤生	負責與上海中共聯絡的連絡員
謝雪紅	負責與東京日共聯絡的連絡員
(d) 其他	
陳來旺	負責東京特別支部
林木順	預定潛入台灣工作
謝玉葉	預定潛入台灣工作
潘欽信	預定潛入台灣工作
林日高	預定潛入台灣工作

清，尤其是中產階級的不可靠性、土地國有化及台灣會主義革命發展等問題。此外，彭派建議組織綱領必須考慮成立共產青年團，但此點謝雪紅提出反對。

資料來源：引自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頁 35，台北：前衛，1997 年

民族支部的職務分配，可看出「上大派」與「非上大派」之間的競爭角力，在工作的分配上，謝雪紅被安排的十分微妙，她是唯一有黨官地位而與基層員分擔同樣工作的領導幹部。翁澤生也是候補中委，卻被分配到獨當一面的工作，且並沒有其他黨員需分擔他的工作。翁與謝二人分別擔任和中共、日共的聯絡窗口，但在台灣的職位分配上，卻可見謝被中共權力派架空的形跡。且翁澤生對於彭湃所提出的主張十分傾心，但謝雪紅較認同服從來自日共的指導命令，兩人的衝突導致外來對民族支部的干預，這干預進而影響到整個台灣民族運動。

1928 年 4 月 25 日，大會成立十日後，日本秘密警察取得中國國民黨及法國租界當局的默認後，迅速對民族支部採取逮捕行動，此舉對新進成立的民族支部是一記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對謝雪紅派的台灣共產黨人看來，當時已日益惡化的台灣經濟情況，已成為宣傳發展共產主義的溫床了，在這一時期，台灣正面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傳統社會的組織解體、日治下政治經濟制度化的不公平以及日本人的剝削，正好提供台灣共產黨人一個很好的環境，以利其活動及組織。（陳紹馨，1979：107-127；Almond Gaimusho，1954：381）

（二）謝雪紅的崛起與失勢

謝雪紅，是台灣左翼反日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名字，但謝雪紅的重要性在台灣歷史中一直是隱諱不明的，她受到忽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有關台灣社會主義的研究始終是一個禁忌。（陳芳明，1998：30）1920 年至 1945 年，是謝雪紅加入左翼運動的時期，她嚐盡了作為共產黨員所會遭受到的痛苦，而謝雪紅所扮演的反抗者的角色，也使得她在歷史上的評價始終被粗糙的對待。但謝雪紅所領導的政治活動，代表了 1930 年代全球反抗帝國主義浪潮的一部分，也代表了台灣殖民地社會拒絕接受資本主義支配的力量。

謝雪紅在台共建黨的歷史上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具爭議性的，雖然她曾經獲得台共的領導權，但不久又因為和「上大派」⁷在建黨路線上的爭議，而導致她幾次被台共內部開除。謝雪紅的個性堅毅從她對台灣反日運動的堅持並可看出

⁷ 「上大派」是指 1925~1927 在上海大學讀書的台灣留學生，他們陸續回到台灣後分別加入台灣文化協會，逐漸形成台灣反日史上所謂的「上大派」。這是一個比較方便的稱謂，在組織上並沒有與中共有直接的隸屬關係。在這些學生裡，直接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大約只有翁澤生、謝玉葉、王萬得、潘欽信人而已。（陳芳明：1998，105）

⁸，她始終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積極的鼓吹台灣應該努力追求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在台共黨內初期的「上海讀書會事件」，初建黨的臺共即遭受了重大的打擊，1928年4月民族支部遭到強制解散，謝雪紅被捕入獄，謝雪紅在被日警釋放後，台共組織卻四處流散並失去了大半黨員，謝在日益惡化的經濟情況下積極重建共產運動，並設法將文協及農組的會員吸收進來，以培植共產黨幹部。

1 與翁澤生的對立

翁澤生與謝雪紅的敵對，有個人因素，也有路線分歧的問題。謝雪紅對中共的淵源並沒有像翁澤生那樣的深厚，謝雪紅對台灣革命的認識，是以「殖民地革命」為主調，而翁澤生則完全依循中共路線，努力把台灣納入半封建殖民地的「社會革命」，對革命性質不同的認識，也決定了他們不同的戰略方針。

台共初建黨時首任書記長是由林木順擔任，當時負責與日共聯絡的是謝雪紅，與中共聯絡的則是翁澤生，翁澤生是瞿秋白的學生，也是中共黨員，他是促成台共分裂的主要關鍵因素⁹。台共一次大會後的職務分配可見到中共刻意將謝雪紅的權力架空，這已使謝在一次大會後對翁澤生產生不滿的情緒，而後上海讀書會事件發生完全擾亂的臺共本身的部署。原定前往東京的謝雪紅反而被迫送回台灣，應該赴台的林木順則永遠留在中國，而應該留在台灣的蔡孝乾、謝玉葉（翁澤生之妻）卻倉皇逃離台灣，在這樣的情況下，台共可說是名存實亡了。而謝在出獄後面臨黨員流散的窘境，後來謝在島內召開第一次台共中央會議，以「機會主義者」的稱號對在上海讀書會事件中因恐懼而逃亡中國的謝玉葉、蔡孝乾、洪朝宗等人開除黨籍，也造成日後謝雪紅與翁澤生之間的緊張關係。

翁澤生因為謝雪紅開除他妻子的黨籍，他後來便利用島內台籍的共產黨員向謝雪紅奪權。當謝雪紅計畫依循日共的「二七綱領」重建台共時，遭遇了渡邊

⁸有關謝雪紅性格之頑強剛烈，從目前已知的資料中呈現的，可謂十分鮮明生動。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記述謝雪紅留學莫斯科時期的歷史時，蒐集了不少側面相關資料，譬如當時也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對謝有印象的楊子烈，她在回憶錄裡便形容謝雪紅個性驕橫、倔將，對林木順「動輒咬牙切齒用台語斥罵」；史治在《鐵幕人物》提及謝雪紅在東方大學時期，「以『臺灣革命人物』自負，流露著趾高氣揚的氣概，…」、「喜高騫遠」及「剛愎自用」等。轉引自陳芳明，前引書，頁72-75。另外於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期間，擔任日本班翻譯者的蘇聯人耶洛獻克，雙目失明，他看不見謝雪紅的形象，但認識近兩年後，他對謝說，她的性格，是「勝過男子的剛毅婦女」。參謝雪紅自述，前引書，頁201。簡炯仁在其論文訪談謝的戰友郭德欽時，郭說：「她主見很強，只要她決定之後，就深信不移；她的舉止像個男人，她給我的印象是自律很強的女人。」另訪談保守派領袖蔡培火談謝雪紅，蔡認為謝有強烈的權威人格，喜出風頭；黃石樵在《台共秘史》中亦描述謝雪紅是一位意志堅強的女人，決不屈服於日警的烤打，甚至被刑以香煙灼其陰部，亦絕不招認任何事情，「真是一位勇敢的女鬥士」。參簡炯仁，：1997，59。

⁹ 翁澤生的生平可參閱肅彪等：1989，141-160。

政之輔被槍殺的事件，這件事使得台共又遭受重大的打擊，台共與日共的聯繫中斷，而中共的勢力則趁虛而入。1928年10月18日，及渡邊政之輔去世約莫十一天左右，中國共產黨在台北成立「台灣支部」。中國共產黨此舉是違背第三國際「一國一黨」的指令的，因為根據第三國際的綱領中的規定，台共應屬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而中共若是願意協助台共的話，就應該幫忙台共與日共聯繫起來，而不是在島內建立中共的台灣支部，介入台共的組織系統。中共的指導干涉，終於造成台共黨內的宗派對峙，屬於中共派系的王萬得、翁澤生、潘欽信等人加入了台共中共支部的組織，謝雪紅在重建台共時，根本不知道有這個組織的存在，因此在領導上就發生了困難¹⁰。在之後的路線主張與謝堅持日共領導路線的緣故，台共中的「上大派」對於謝雪紅提出了猛烈的抨擊與質疑。

翁澤生在之後更與「上大派」聯合向謝雪紅奪權，上大派對於革命路線的急進主張受到了謝的阻撓，由於「上大派」深知謝對第三國際的指令相當服從，於是便透過翁澤生和中共取得連絡，翁澤生通過瞿秋白使用中共中央與第三國際的名義，使台共的上大派信服。他們於1931年秘密召開「改革同盟」會議，又於1931年背著謝直接舉行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會中由翁澤生起草的〈共產國際東方局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蕭彪等：1986，152）¹¹更是直接批判了謝雪紅的領導，指控她「積極性不夠充分，對台灣革命鬥爭沒有加以領導及組織」，文件中更說到，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達到最高的發展，在農民戰爭中高舉蘇維埃的旗幟。因此，台灣共產黨也不應該「自外於日臻高潮的革命鬥爭」（盧修一：1989，218-26）在大會中正式開除了謝雪紅、林木順、楊克煌等人的黨籍，重組新的權力架構，台共內的中共路線可說是完全勝利，台共內的中共路線造成台共的分裂，翁澤生並沒有協助台共運動的提升，翁澤生雖是一個忠誠的中共黨員，但對於台共的發展歷史，翁澤生挾著中共勢力對台共內部的干預卻造成台灣左翼運動的極大傷害。

II 聯合陣線主張受抨擊

上海讀書會事件發生後，同年6月當謝雪紅在台灣獲釋，便著手開始訪問台

¹⁰ 日共市川正一在1929年4月被捕時，日警獲得了一份文件，名稱是〈台灣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這份文件透露，中共在台支部是潛伏存在的，其他台共黨員並不知道。（陳芳明：1998，123）

¹¹ 蕭彪、楊錦和、王炳南、許偉平〈翁澤生〉，收入中共黨史研究人物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7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14。

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的組織，同時恢復與一些歸台的臺共黨員聯繫，企圖重新組織台共，而這段時期，也是她聯合陣線主張的初步實踐。

在台共第一次大會時，參加者曾就台灣島內的政治團體進行審議。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台共究竟要與島內既有團體維持何種關係？有一種看法是，利用已經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作為台共的外圍大眾黨。另一種看法則是，以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為中心，另組一個新的大眾黨，雙方在辯論之後決議，便是以台灣民眾黨與台灣農民組合為中心，結合其中的積極份子，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再把文化協會改造為大眾黨。這是由於台共本身是一個秘密的組織，它需要一個合法的、公開的政黨作為掩護。謝雪紅回到台灣之後仍舊遵守這項決議，所以在獲釋後，便積極與農民組合的成員建立密切的關係，可說是她遵守其聯合陣線理想的實踐。謝雪紅把台共的勢力納入農組中獲得了該組織的領導權，使得台共能夠藉此公開合法的團體對外界工作宣揚共產理念，但也由於台共勢力的介入使得農組內部發生內鬨，楊貴就是因與謝雪紅衝突離開農組，這也是謝雪紅在歷史上公桌所以有不同評價的原因。

爾後上大派在當權後，其極左路線的抬頭，對謝雪紅領導構成極大的威脅，因為謝是一個漸進主義者，他採取滲透的做法使其他的政治團體逐漸左翼化，和他的策略也成功使得農組及文化協會在政治思想上轉向，對於台灣民眾黨她也擬採取同樣手法。1929年，她介紹陳其昌與蔣渭水認識，陳其昌與蔣渭水認識後便積極影響蔣渭水的政治思想，民眾黨在1929年明顯的左翼化，據陳其昌的口述乃是因為蔣渭水受到陳其昌的影響。但上大派由於其極左路線的基調對蔣渭水予以猛烈的抨擊，他們所抨擊的蔣渭水是思想路線和政治主張還未改變前的蔣渭水，而且他們對蔣在1930年左右的轉變也並不重視，對於台灣民眾黨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分歧也不在意，對極左人士而言，他們一律被視為右派份子，是「資本家走狗」。謝雪紅的務實觀念，和上大派的極左人士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III 「上大派」對謝雪紅的批判

台共在建黨之初，就籠罩在中共的陰影下，這是因為台共建黨時所吸收的黨員，有一些人早已參加中國共產黨了。這其中「上大派」和謝雪紅的路線紛爭，更是造成台共組織潰散的主因。1929年重組後的臺共面臨政治及經濟情勢的不安定，日警隊左翼運動團體施行嚴密的監察控制，謝雪紅降低宣傳姿態轉往地下活動，但這樣的「不動主義」成為台共少壯派抨擊謝的藉口，以「上大派」為中

心的臺共黨員，更對謝雪紅提出了下列幾點的批判：

1. 台共應該解散台灣文化協會的問題

謝雪紅認為文協的存在，可以使台共有合法活動的空間，且改組後的文協性質也偏向左派，可以與其保持聯盟的關係。但「上大派」的翁澤生、王萬德則堅持解散文化協會，他們認為像文協這樣小資產階級團體的存在，將妨礙政治運動的無產階級化，也會影響台共在反日運動本身的領導權。他們抨擊謝雪紅偏袒小資產階級，是一種「機會主義」立場。

2. 對於台灣工人運動領導權的問題

謝雪紅認為台共的迫切工作是先到各地發展小工人組織，等到各地草根組織崛起後，再成立一個總工會領導。「上大派」認為台共必須優先建立一個「台灣赤色總工會」，直接領導台灣各地的工人運動，而且無論日警如何鎮壓都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關於此點，筆者認為謝的主張其實與當時的連溫卿是相似的，只是謝雪紅不可能坐視工會領導權落入他人手中。但謝基於聯合陣線的戰略支持連的敵對王敏川，這與「上大派」支持王敏川的原因不同。上大派支持王敏川是為了利用他打擊連溫卿，當將連擊垮後，便準備著手解散新文協，謝雪紅與上大派的主要分歧就在於此。

3. 台共與第三國際聯絡管道的問題

謝雪紅自始都極為堅持與日共系統保持關係，也以日共的命令是從，這是因為共產國際的指令中所規定的。在日共被破壞後，謝雪紅希望能直接與第三國際建立關係。而「上大派」的立場則是希望台共能接受中共系統的領導，因為第三國際東方局設在上海，而翁澤生便通過瞿秋白的名義（因瞿在1929年不僅是中共領導人，而且也是第三國際的代表），之後謝被開除黨籍，中共系統也取得主導地位。但上大派的運動路線卻是完全悖離第三國際的指導，他們的路線甚為激進，這些都是中共政治路線在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反應，上大派忠實中共路線的結果，導致台共內部激進路線的抬頭，也使得謝雪紅在黨內的領導受到挑戰。

謝雪紅也受到留日青年的排擠，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謝在運動宣傳上不夠積極，這類意見可以蘇新為代表，蘇新曾說：「黨的領導中央內部有問題」又說「國內也派人回來跟我連絡，就是我提到過的翁澤生，主要都是牽涉到謝雪紅的關係。黨內的領導工作，謝雪紅實在沒有辦法在做下去，台共黨的領導，要靠這

幾個日本回去的和（留在）台灣的一些人。（蘇新口述，蔡福同整理：1983，35）」謝在被開除黨籍之前，由於意識到台共內部間的宗派分歧，召開了「松山會議」。松山會議對台共在島內發展的意義，是第一次具有反省檢討意義的內部會議，但會議結束後台共黨的分歧不但未見解決卻更加嚴重。自松山會議後，謝雪紅在黨內勢力幾乎被上大派所架空，台共受到中共的第三國際指揮，極左路線的黨員秘密集結，一面成立新中央向謝奪權，一面與中共接觸以便建立與第三國際聯絡的管道。

1930年冬天，謝雪紅完全捲入黨內的鬥爭中。翁澤生、王萬德等上大派台共黨員未貫徹在松山會議中提出的總工會路線主張，採取冒進策略成立「改革同盟」，積極抓住台共的領導權，並和謝領導的黨中央切斷關係¹²，改革同盟在1931年召開的第二次臨時大會便將謝雪紅、林木順、楊克煌等人一併開除了，大會結束後改革同盟也宣告解散，改組後的臺共路線是急進左傾的，這也使得日警對台灣共產主義的查緝更加嚴密。

日警在1931年的臺共大逮捕，象徵了台灣左翼運動的結束，也象徵了整個台灣反日運動的終止，但台共的內鬥卻仍未見結束。這次事件中謝雪紅也被株連逮捕，在被捕的同天，謝雪紅正好派劉纘周聯絡第三國際，但劉回台後謝已被逮捕，劉纘周便負起台共重建的任務，但劉對重建台共任務也是欲振乏力，台共組織已名存實亡，太平洋戰爭末期台共成員雖被一一釋放，但成員四處流散，曾經追求台灣民族解放的台灣共產黨，至此已完全支離破碎。

（三）台共覆滅原因的探討

I 台灣總督府的恐怖鎮壓

日本人據台之後，便在台灣設置一個強而有力的警察系統，日本的警察系統順利地滲透入台灣的社會結構，並將台灣人庶民的社會（Folk society）了，使台灣傳統社會及夠產生自主性的崩壞，強化了日本人在台的霸權，同時也阻礙了台灣的民族團體，包括共產黨，及任何草根支持的勢力。（簡炯仁：1997，154）在日本國內因為左翼共產運動而開始對共黨人士進行大檢舉時，日本帝國政府也

¹² 改革同盟成立的最大目的便是抨擊謝雪紅的領導。他們對謝雪紅的不滿大約有如下數點：第一、在組織上犯了閉鎖主義的錯誤，偏向讀書會方式的理論教育，擴大了黨的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第二、在政治上犯了不動主義的錯誤；第三、沒有確立黨的機關與細胞；第四、黨員缺乏組織生活，對黨的政治綱領與其他黨的政策也缺乏了解；第五、黨的各級機關與各支部沒有明確界線；第六、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領導與指揮並不充分。《警察沿革誌，677-678》而這些批評的焦點，明顯都是針對謝雪紅本身。

重組「特別高等警察」制度，研究左派運動並指揮台灣特高系統。

1928年6月29日，帝國議會又修改「治安維持法」，授予總督府權力將左翼人士判處終身監禁，甚至是死刑。台共在宣傳共產主義更是要時常躲避日本警察的騷擾和鎮壓。在1931年的臺共大逮捕，台共的共產黨員有許多便因為受不了日警的殘酷刑罰而病死獄中，如謝雪紅並遭受到許多極為殘忍及不人道的酷刑，台共面對日警對其組織的強力鎮壓，根本很難發展共產理念的宣傳。

II 日共的指導力量不足

日共從建黨開始，即以傳播馬克思意識形態的方式，向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擴展它的影響力。1927年底日共著手準備組織台灣共產黨團體，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傳播，同時也肩負著第三國際指派的任務，同一時期，渡邊政之輔自莫斯科歸來，他在莫斯科接受了第三國際有關組織台灣共產黨的指示。因此，中央委員會決定創建台灣民族支部，作為日共的一部分，為了創立台共，同時也採用了由渡邊政之輔極佐野學起草的政治大綱和組織大綱草案。

台共作為日共的民族支部，應該接受日共的指導，但事實上從一開始日共的指導力量便不足，當謝雪紅與林木順抵達東京，想從日共手中接受有關台共成立的建議時，日共當時正為了1928年的議會普選而忙碌，只有匆匆交給台共兩項建黨大綱草案，謝雪紅與林木順二人依循第三國際指示將台灣共產主義運動進於實踐之指令而返歸上海，並從中共方面尋求支持；至於台共成立大會上，日共代表沒有出席，由台共組織大綱的決議中來看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¹³，而這是因為1927年底與1928年初日共遭到日本政府的大檢舉，許多領導者紛紛被捕入獄，不可能參加台共大會，且日共領導人也就台灣共黨團體的組織做過討論，他們甚至已認為日共對「台灣同志」提供指導已變的不可能，佐野學即對中共提出援助台共的要求。（山邊健太郎：1968，236）而這項要求也是屬台共日後內部鬥爭混亂的原因之一。

之後日共對台共的指導狀況，隨著1928年謝雪紅重建台共而有具體明確的政策規劃，但1929年的日本的四一六大檢舉不僅對日共造成打擊，同時摧毀了

¹³ 台共組織大綱的決議中，特別規定台共與日共的關係：「台灣共產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最為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組織。因此，日本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指令，乃是台灣共產黨必須共同遵守的。換言之，台灣共產黨通過日本共產黨，來達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個支部的任務。」原始資料見於「台共組織大綱」山邊健太郎編〈台灣共產黨檢舉の概要〉，收入《台灣（二）》（現代史資料22，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256，筆者引陳芳明：1998，109。

台共東京特別支部，使得台共與日共的關係徹底斷絕。謝雪紅只能被迫尋求中共支持，謝的舉動造成日後第三國際的介入，台共成為直接受命於第三國際的政治團體，而後被開除黨籍的謝雪紅雖派遣劉纘周前往日本試圖建立與中共的關係，但日本共產黨團體卻已被日警摧毀了。但是與台共同樣身處壓迫情況下的日共，雖然其指導力量不足進而造成中共的奪權及強勢介入，但由日共的立場來看是可以理解的。

III 中共的強制介入

中共對台共的負面影響，是一個嚴肅的歷史課題。根據共產國際的指導，各國共產黨在「一國一黨」的原則下著手建黨，若是出現兩個黨組織，將造成領導上的雙重主義，以致造成左翼運動的分裂，而台顧建黨的殖民地革命策略與台灣民族理論，也是根據第三國際的指令，因此台共成立時就被規定必須接受日本共產黨的指導，因為當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但中共從建黨之初便開始違背共產國際的策略，它命令台籍的中共黨員，在1928年10月回台建立秘密的「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而這些成原則是以「上大派」為首的翁澤生、王萬得、潘欽信等人。中共代表甚至認為自己便是促成台共在台宣揚革命的推手，臺共在上海召開第一次的成立大會，由於日共正好遭遇大檢舉無法出席，中共代表彭榮出席致詞，而這段歷史也被中共解讀為彭榮鼓勵台共早日返台發展革命，寓意台共是受中共指導的，這種說法是來自台共成員王萬得在1975年陳述有關台共回憶時的說明¹⁴。

而台共在島內出現兩個共黨組織時，自然發生了領導上的困難，根據後來被捕的陳來旺的口供，就提到如下的困擾：「去年（1928）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在台北創立，目前在台北、台中兩處個有一個小組。因而（台共）有這樣的說法：『要結合台灣內部的這些中國共產黨員（台灣人），防止其動搖，已達到統一行動的目的。最為危險的是，我台灣民族支部活動之和諧，很難確立領導權。然而，我們必須相當努力，以便吸收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¹⁵（山邊健太郎：1971，90）陳來旺在被捕前，曾經撰寫一份報告〈台灣的黨組織活動方針及其組織狀態〉，說明台共在領導上的困難，這份報告後來自市川正一處被蒐獲，

¹⁴ 〈王萬得關於台共歷史的回憶材料〉，轉引自蕭彪等〈翁澤生〉，頁151，但王萬得的說法似乎不可信，因王並沒有參加建黨大會，而且它是謝雪紅終生的政敵，中共採取王萬得的說法，自仁然為了強化中共「領導」台共的解釋。

¹⁵ 參閱〈陳來旺聽取書〉，收入山邊健太郎：1971，164-165。

但由報告的文字中也可看出台共的處境¹⁶。

而這些中共的台及黨員加入台灣共產黨後，一方面奪取領導權，一方面則採取金進的社會革命路線，終於導致整個台共組織的分裂滅亡。翁澤生藉著瞿秋白第三國際代表的名義向謝雪紅奪權，並和上大派的勢力結合向謝雪紅的黨中央提出嚴厲的指證，這些都是希望能將台共的領導權轉移至中共手中，其後上大派更組成「改革同盟」開除謝雪紅，雖然謝在之後對指控內容提出反駁，但她也被日警逮捕入獄了。

由台共建黨至覆滅的歷史來看，中共對台共不僅未提出幫助，反而對台灣反抗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處處阻撓，使得台共陣營產生分裂，終而導致台共的覆亡。

第二節 勞工運動與台灣工友總聯盟之發展

1910-1920 年代，一連串的社會變遷，如全島交通網的設立、都市化和工業化促進各族群及城、鄉之間人口交流，也強化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的意識。日治初期反日事件之頻仍，足以反應這種新台灣意識的興起。這種台灣意識經過知識份子的宣導、修飾，終於發展成「台灣民族主義」的觀念。(Comaroff, 1984; 張深切、蕭友山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普遍的不景氣對日本本國的衝擊相當嚴重，台灣總督府遂積極壓榨台灣經濟，台灣社會呈現極端不安，原本在文協內的知識份子遂將純文化的抗之目標轉移到經濟問題的抗爭上，協助農民成立「二林蔗農組合」以及協助工人組織工會對抗資本家。

一、台灣勞工運動的形勢

(一) 工人運動的分化

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想使台灣成為一個供銷的基地，將台灣的農產品供應給日本，而將日本的工業產品銷往台灣。所以台灣的工業部門直到 1930 年年底，除了製糖工業之外，甚少受殖民政權的注意。在台灣殖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中，

¹⁶ 這份報告中指出台共領導的困境：一、中共台灣支部的成員分成兩個地域性小組，很難確立領導權；二、令人不堪想像的是，這些中共台灣支部成員竟然不知道台共的存在；三、台共成員清一色都是知識份子，沒有實際上的運動經驗（山邊健太郎：1971，164-65）

將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兩相比較，可以說明台灣工業發展的遲緩情形。(張漢裕：1955，74-128)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工業需求顯著成長，但相對於在日本資本企業下的台灣工人薪資卻非常低廉，日本殖民者更對台灣勞工抱持「領導者」或「監視者」的態度，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1926年開始爆發了台灣工人運動，1927年開始，由於文協和民眾黨爭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更為特殊。(見下表)

表 3-3：日治時期工人的衝突和組織

	工人的衝突		工人的組織	
	衝突次數	參與人數	組織數目	會員數目
1926	26	1280	7	1730
1927	69	3312	57	8175
1928	107	5445	103	12008
1929	49	1900	114	12993
1930	59	15706	109	25190
1931	52	2256	114	21295
1932	29	2002	110	21203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1220、1224、1225，南投：台灣文獻館，2005年。

當時全島工會的罷工運動所引發的衝突卻未能引起廣大迴響，因一方面有日本的壓制，另一方面也因為連溫卿和王敏川在文協指導路線上意見分歧所致，而工會的領導份子陸續被拘禁逮捕，使得工會活動日漸衰頹，部分會員便轉移至台灣民眾黨創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繼續從事勞工活動。

(二) 台灣共產黨的勞工運動指導方針

昭和3年(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結黨的台灣共產黨於「勞工運動對策提綱」中規定有關勞動運動的諸方針。其要旨為：「台灣左翼勞動組合在文化協會的指導下蒙受福本主義的影響而限於宗派主義的謬誤，右翼工會則被民眾黨幹部改良主義之欺漫所誤導。故黨應該派黨員到勞動運動的前線，以克服左翼工會的謬誤，暴露右翼工會指導者的欺瞞，使工會大眾左翼化，展開左右兩翼的共同陣線，以促進台灣總工會的組成，再以此為產業別、地方別組織來設置工會支部，置於黨的影響下，從日常鬥爭中吸收優良工人份子到黨來，將所有的鬥爭

導向無產階級獨裁的方向，加盟工會國際以遂行無產階級的國際性任務。」

昭和3年8月，台灣共產黨組織者林木順自上海秘密潛赴東京，與日本共產黨中央恢復聯絡；10月，結成了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又與自台灣到東京聯絡的林日高相遇，聽取島內情勢，並將同年11月及昭和4年2月前後兩次，日本共產黨有關台灣紅色總工會組織運動指令寄來島內中央。上述11月指令是陳來旺筆記了日本共產黨指令要旨寄給林日高，指示要「發行黨的機關報，宣傳、煽動黨的綱領政策，吸收革命的工人、農民，建設工廠細胞、農民細胞」的一般指令，謝雪紅認為其指令本身忽視台灣客觀環境諸情勢之處太多，她報告了台灣的情勢，並要求再檢討上述指令。其後不久，於2月「勞工階級的階級性結成與黨的任務」之指令到達，以後紅色總工會組織即基於本指令進入準備活動。

二、臺共成立台灣赤色總工會

台共自接到了日共的成立總工會的指令，但台共組織紅色工會組織運動幾乎沒有可觀的進展，綜觀紅色工會組織運動的狀況，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其一為本島重要產業部門，都是過去工會組織為開拓領域留下來的北部礦山勞動者、鐵路部及其他主要交通機關從業人員、各地主要工廠勞動者之工會組織活動；其二為取得文化協會幹部指導下的已設左翼工會的指導權；其三為使台灣民眾黨、工友總聯盟系之工會左翼化，以下就此三點試作分析：

(一) 關於工會的新設運動，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於昭和4年4月，派遣為進行島內實踐的東京學術研究會左傾份子歸台，首先開始了基隆地方碳坑勞動者的組織運動，接著著手於基隆、台中、彰化、高雄之鐵路從業人員雄鐵路工廠勞動者之組織準備，並對其他各地的主要產業勞動者進行基礎調查，但只有北部碳坑的礦山工會準備會、高雄的交通運輸工會準備會稍有進展，可是尚未結成工會即潰滅。

(二) 關於確立左翼工會的指導權，比第一的工會新設運動顯示更耽誤機會。機械工會聯合會在黨員王萬得等人指導下召開了第二次大會，除根據黨的方針採用新行動綱領之外，殆無具體進展；以印刷工聯合會為基礎的出版工會組織運動，以製材工聯合會為基礎的木工工會組織運動，自黨改革聯盟成立前後開始著手，只不過經由台灣紅色工會組織運動準備委員會台北組織幹部會議指導的程度而已。

(三) 對工友總聯盟體系勞工團體，既從上面提議共同戰線，又對下面派遣工會組織幹部，逐漸致力於取得指導權，但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成果。在以上各活動的過程中，為了統一進行這些組織運動，組織幹部和一些成員揚言要結成台灣紅色工會組織運動準備委員會，但不久即因共產黨遭到檢舉潰滅。至於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共尋求「由上層聯合」和「由下層鬥爭」的策略。這就是為了共同的鬥爭行動應組織一個委員會結合成總聯盟，同時派遣黨工進入工友總聯盟內部，爭取工人群眾。由於黨員數目仍屬有限，且多出任文協和農組職務，因此要在敵對陣營中建立領導地位實屬幻想。此外，雖然民眾黨和工友總聯盟也強調聯合陣線的重要性，但就整體來說，其結果似乎一無所成。

三、臺共指導下的勞動爭議

台灣共產黨自昭和 5 年（1930 年）底開始積極進入工會組織運動，隨者勞動爭議的指導激發亦顯示了大有進步。因此，台灣勞動爭議一時召來未曾有的尖銳化，但原本就不是根據大眾強烈要求的這些勞動爭議，隨著時間的經過也明顯的暴露了內部脆弱性，指導團體雖仍舊繼續活動，但個別團體卻因個別妥協而復業、歸農或轉業，致使爭議趨於自然消滅的過程，連部份成功的例子也沒有，充分暴露了台灣勞動運動的特質。

昭和 5 年底以來，在台灣共產黨指導下進行的勞動爭議有高雄市苓雅潦草代工廠爭議指導、台灣膠版印刷公司爭議指導、石底碳坑勞動爭議之指導等。

(一) 高雄市苓雅潦（寮）草袋工廠爭議

這個地區有六家台灣人經營的工廠，共有 207 名女工。其成品都由台灣肥料、杉原製肥的會社承購，1930 年末的不景氣，女工的工資被銳減，台共南區黨員簡娥、孫玉蘭在 12 月 4 至 15 日期間，先後發動各廠罷工。月底，女工們又爭取在廠內設置廁所，改善衛生，夏季供應茶水等事罷工。1931 年 1 月 1 日，呂和布、郭秋源、張滄海、翁甲、李明德等人召開群眾大會，號召市民支持。歷經一個多月，女工們漸漸屈服，85 名罷工者有 16 人回去工作，罷工也就失敗了。

(二) 台灣膠版印刷公司爭議

昭和 6 年（1931 年）2 月，台北市宮前町台灣膠版印刷公司為打開當時的不景氣而宣布實行縮短作業時間，一個月就業二十二天的策略。該公司的職工對此

宣告不滿。早已致力台灣膠版印刷工會組織運動的改革同盟幹部王萬得，於是透過該公司職工陳兩家將它誘導籌為爭議化，結果，2月4日，該公司職工四十九名（內女工十三名）表明反對縮短作業期日而一起怠工。公司方面為淘汰一部分不良職工，翌日公佈臨時休業；但公告被職工撕破，職工的騷動愈益升高。同一天，在黨員指導下召開職工大會，決議於6日向公司提出要求書。但持久冗長的爭議仍是以勞工方面的慘敗而結束。

（三）石底碳坑勞動爭議

1931年3月，謠傳要減少工資，蘇新回台北與陳德興商議，黨派謝祈年到現場支援。4月1日蘇、謝進入第一坑號召礦工罷工。第二、第三坑也支援，但業主卻另雇新人入坑，雙方僵持到4月5日罷工失敗。

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比其他的帝國主義運動遲晚，而這個運動一開始即分裂為兩個陣營，一是頗佔優勢的右派集團；一是勢力弱小的左派集團，如此相互傾軋，相當不利於工人無產階級意識的形成。而且台灣工業始終停留在低度發展的狀態，工會大體上不像農運那麼成功，但是在同樣的大環境下，他們卻遭受被壓迫的相同命運。

第三節 農民運動與台灣農民組合的發展

一、台共對農民組合的掌握

（一）文協時期的農民組合

在日本殖民政治初期，台灣農民佔總人口的90%，但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台灣而來殖民地的經濟進化，農業人口已日漸降低。但農民仍是占人口的大多數，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日本殖民時期結束。

農民可以分為下列三個類型

表 3-4：日治時期台灣農民的分類（以千戶為單位）

分類 年份	總計		自耕農		半自耕農		佃農	
	單位	%	單位	%	單位	%	單位	%
1922	386	100	117	30.3	112	29.0	157	40.7
1928	406	100	118	29.1	125	30.8	163	40.1
1938	425	100	130	30.6	136	32.0	159	37.4

註：所謂半自耕農，在此指既是自耕農又是佃農

*資料來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 51 年來統計提要〉，頁 513，台北，1946 年。

佃農和半自耕農占農民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地租過於高昂，高達農民收益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佃農並負有納稅的義務；儘管殖民地的農業有所發展，但是農民階層仍過著極為困苦的生活。再加以土地所有權非常集中，一方面，百分之六十四的小地主每人所有土地不超過「一甲」（零點九七公頃），這些土地加起來不超過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四點五三；而占人口百分之零點一四的中地主和大地主，則占有百分之十六點六的土地。另一方面，日本人佔有台灣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一，其中百分之七十屬於日本人所有的製糖工業。台灣農民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出來的。

1926 年中，當各地農民組合以「台灣農民組合」名義組成一聯盟組織，簡吉與虎尾農民組合負責人趙港一同前往日本，代表台灣農民向日本帝國議會陳情，並參加在日本舉行的日本農民黨的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且經由許乃昌的引介，會見了日本農民黨的領導人物布施辰治及大山郁夫兩人。日本勞農黨深受日本共產黨的影響。因此，簡、趙兩人深深地被福田和夫的革命理論所吸引¹⁷，深信福本主義才是台灣革命正確的指導原則。當時台灣尚無共產黨的組織，農組是唯一頗具規模且富階級性的運動團體，他們依循日本的行動模式放棄被動的請願，除了鼓勵農民大眾示威之外，並採取激進的行動。他們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並和階級鬥爭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¹⁷ 當時福田和夫的理论取代山川均的思想而成为日共当道的理论。山川均主张，日共在面临日本政府全面取缔下，应该先行解散，使其党员深入社会团体进行群众运动，以培植共党的全重基础；相反地，福田则强调日共必须维持其组织，并透过各政治团体相互间的政治理论斗争，以传播共产主义。参阅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衛，1997）頁 44。

農組左傾後，他們不時與日本左派的農民組織密切聯繫，並請求他們安排高級幹部來台輔佐農組的鬥爭技巧，日本一共推派了 13 名社會主義的律師來台，其中還包括布施辰治和吉屋貞雄兩人，日本左派的協助使得農協的發展神速，農組初成立時會員超過兩千三百人，1927 年 11 月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前，會員有兩萬一千三百人，到了 1928 年底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已達兩萬五千名，共有 26 個支部，4 個區域性支部組織。這一的情形在 1928 年初成立急欲擴張勢力的臺共看來，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經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的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赤松克磨，1963：31）

（二）台共的計畫性滲透

台灣農民組合於第一次全島大會中，路線已確立朝向「馬克思主義化」，此舉更為台灣共產黨滲透台灣農民組合提供了良好「溫床」（王乃信，1989：133）因此，台灣共產黨選擇與蓬勃的台灣農民運動合作，自有其客觀條件。在台灣共產黨的建黨大會後提出的「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中，明確地指出台灣農民組合雖具有統一性，但在思想或實踐方面犯了種種錯誤，其中比較重要如下：

- （1）把農民認定為無產階級，從而將農民視為台灣革命的主力、領導者，根本上忽略了無產階級的作用。
- （2）雖成為農民運動的指導體，但使得大眾農民組合與政黨產生混同現象。
- （3）不但沒有瞭解農民的實際需求，而且農民組合全體竟然否認民族革命運動，只高唱階級鬥爭，此係因為接受福本主義所致，根本上與現實的客觀條件不符合。
- （4）輕視群眾的日常鬥爭，幹部只熟政治鬥爭，搞得農民運動趨向獨立的形勢。
- （5）對於工農的同盟未曾有過具體行為。（王乃信，1989：61）

由於台共是一個地下秘密組織，便試圖以台灣文化協及台灣農民組合作為其合法的掩護，積極結合或吸收其中的份子成員厚植實力。謝雪紅透過「社會科學研究部」，台灣共產黨與台灣農民組合簡吉、陳德興、楊克培等人建立了聯繫與合作關係，謝雪紅也積極招收台灣農民組合重要幹部成為台灣共產黨的黨員，當時台灣農組幹部中計有簡吉、趙港、楊克培、張道福、林樑材、簡娥、葉陶等人加入台灣共產黨（黃師樵，1980：16~58）。此一結果，造成台灣農民組合中傾向台灣共產黨之幹部與非幹部的對立與分化，楊逵一派隨即在開除逐出農民組合，這時的台灣農民組合的「台灣共產黨色彩」已極為濃厚。

（二）台共發表「農民問題對策」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台灣農民組合召開第二次全島大會前，台灣共產黨書記長林木順及在東京發表「農民問題對策」，欲以此言論在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召開時確切反映「黨的影響使命」。迨第二次全島大會召開後，以「農民問題對策」為核心指導原則，冀求依照此對策，「土地還給農民」的口號將優先提出，工農聯盟也是要緊的任務，同時強調台灣農民組合應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繫起來。

在此情勢下，無論從指導路線的確立、組織工作的強化，職務的調整分配上，台灣農民組合在第二次全島大會中，完全已為台灣共產黨所掌握。

二、台共對農民運動的激化

（一）二一二事件

1927年至1929年，日本總督不得不正視農民運動的發展，然而儘管日本當局不斷的壓制（例如1927年和1928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壢事件），農民運動仍日漸滋長起來¹⁸。因此日本當局決定要對付農民領導機關。一方面是為要破壞農組的活動，另一方面藉以瞭解台共與農民組合之間的關係。這項撲滅行動發生於1929年2月12日，後來被稱為「二一二事件」。

「二一二事件」事件的發生使得多數的農組領袖遭到日本當局的逮捕與拘禁，農組會員也因此銳減下來。台共想從這次事件獲得發展機會，派遣東京科學研究會的積極份子返台，進行農民組合的重組活動。1929年底，由於「二一二事件」後改變立場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黃信國籍一些溫和派份子離開了農組，農組的指導機關因此在台共的監護下進行改造，簡吉、趙港、張行、陳德興、楊春松等提名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由楊春松出任主席職務。常務委員會採納趙港草擬的「行動計畫」，具體名示在政治、經濟和國際的範疇下進行鬥爭活動。

（二）農民組合的沉寂

1930年世界經濟蕭條，不僅影響日本國內經濟情況，在殖民地台灣農業方面，因感受到資本蕭條的壓迫，農民糾紛在次數和激烈程度上有增無減。在史達林控制下，所謂「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危機在整個世界加速，促使國際主義者的激烈化程度。這種局勢正恰好給1929年下半年進行重組活動的農民，組

¹⁸ 1927年1929年之間，爆發了536次事件，1340人被捕。沿革誌，1989，1021-1022。

合一個推動農民運動的好時機，這段時期已正是台共恢復元氣的時期。

1930 年年底農組的一部份人依據台共的指令，刊行一份“台灣農民組合當前任務”的文件資料，這份文件對農民組合提出批評，要點包括：

1. 對各問題缺乏努力地去激發、組織和指導鬥爭。
2. 中央的決議與指令缺乏理解與徹底行動。
3. 少數幹部包辦。
4. 還存著濃厚的合法主義、組合主義傾向。
5. 沒有對土地問題徹底煽動。
6. 對楊達一派缺少積極鬥爭。
7. 缺少青年、婦女的要求。¹⁹

基於上述的自我批判，於 1930 年 11 月 20 日決定調整台灣農民組合的運動方針，決議欲使台灣農民組合成為台灣共產黨指導下的大眾團體，這項決議在 1931 年 1 月 1 日的竹崎會議中付諸實行。

（三）農組的角色癱瘓

1931 年 1 月的竹崎會議及 1931 年 6 月的農組第三次全島大會，通過許多的鬥爭指令²⁰，此象徵著台灣農民組合已經成為一個非法、地下化運動團體，同時也失去在台灣農民運動中的領導角色。而緊接著的「大湖事件」²¹，原本重建成功的大湖支部也被日警偵破。

1932 年，台共黨內本身也面臨被日本人嚴厲鎮壓的命運，農組和文協的會員均嘗試建立台共，然而都無結果，農組和文協的活動也跟著癱瘓。緊接著的赤色救援會事件後的 1931 年年底大逮捕行動，農民組合、文化協會都跟台共一樣，遭受到被殖民政府壓迫的命運。

農民運動在日治時代的抗爭扮演上，具有重要的關鍵意義，它不僅代表

¹⁹ 《新台灣大眾時報》第二卷第一號，頁 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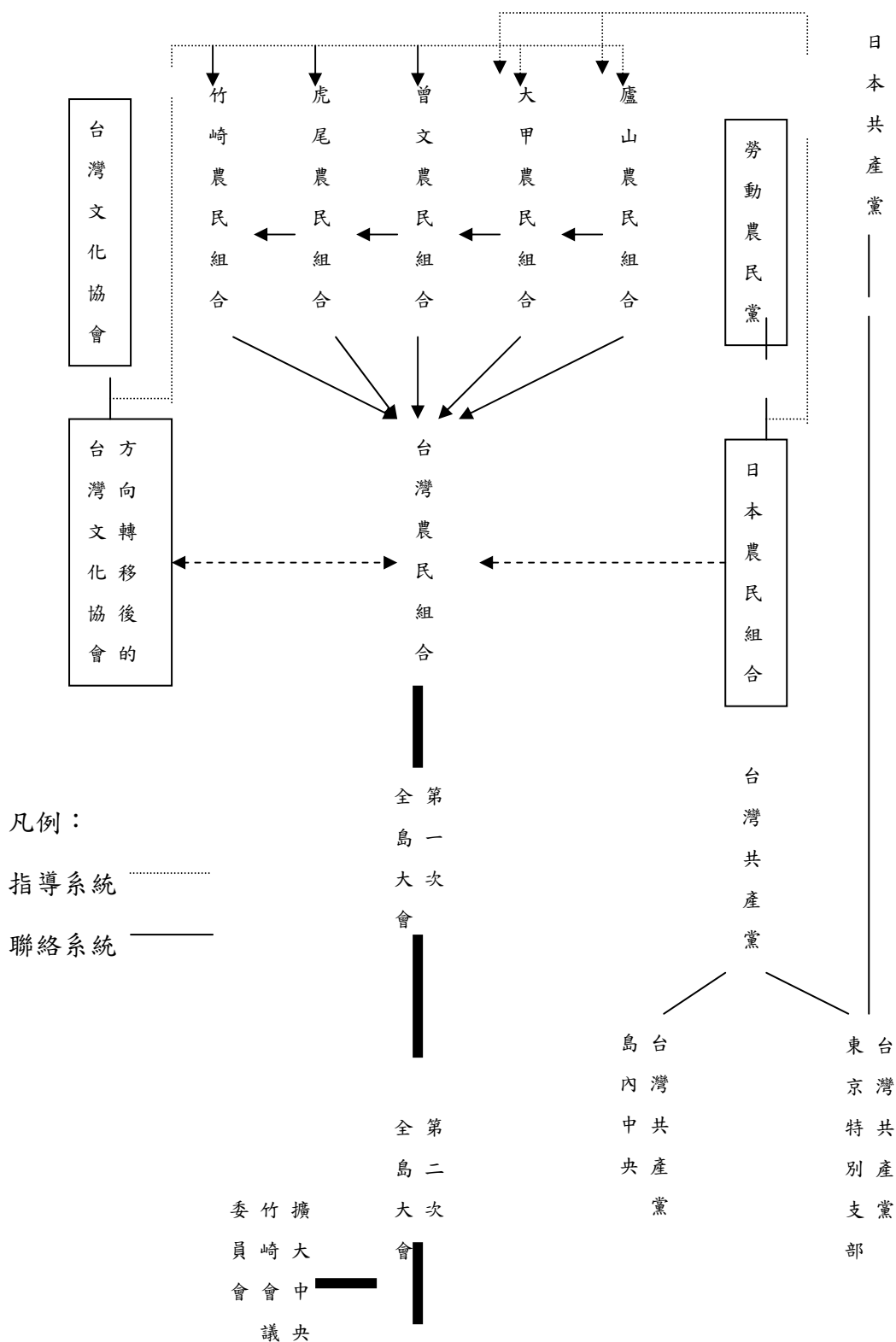
²⁰ 如〈關於第一其收穫鬥爭準備的指令〉、〈二、一二件紀念日鬥爭指令〉、〈國際青年日鬥爭指令〉、〈蘇聯革命紀念日鬥爭指令〉、〈關於國際書局的反動之聲明書〉……等等鬥爭指令。參閱楊碧川：1996，282。

²¹ 台共在 1930 年劉雙鼎任大湖農民支部的常任委員長時，將農民組合編入台共的外圍組織系統，但劉雙鼎之父此時被大湖警察課約談，因此逃亡至竹南郡永如山。劉逃亡後積極組織農民，在 1931 年成立「台灣農民組合永如山支部」。1931 年台共認為戰爭已近，乃向全島發出指令，劉雙鼎命張阿艷等人調查竹南郡役所火藥庫、錦水及公司寮的石油廠，並計畫炸燬縱貫鐵套及造橋的鐵橋。但 1932 年 3 越大湖農民組合的武裝起義因事蹟洩漏，遭到警察逮捕，其秘密組織也被發現，於是武裝起義胎死腹中。

台灣農民為自身的權益向日本殖民經濟作出嚴正的抗議，同時也發動抗爭捍衛自己的權利。而農民運動和台共之間的關聯更是緊密的，台共對於農組路線的提出即對農組成員思想上的影響，可以說台共的指令是造成農民運動執行路線的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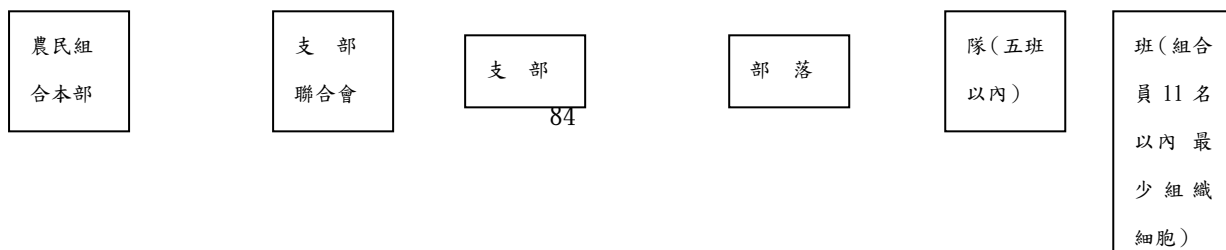
表 3-6 台灣農民組合聯絡系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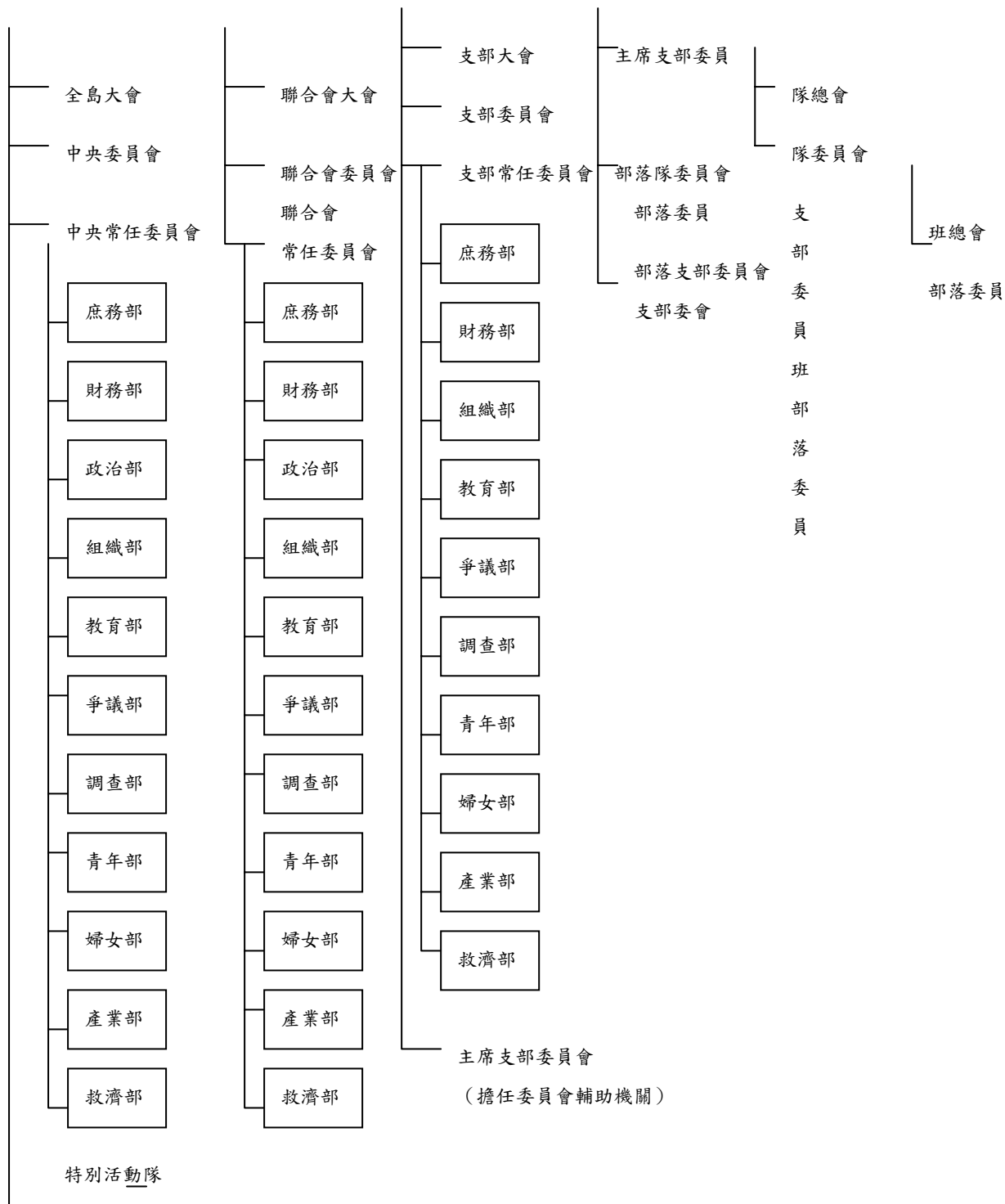
台灣農民組合聯絡系統圖



*資料來源：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年〉，頁115，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

表 3-7 農民組合聯絡組織圖





* 資料來源：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年〉，頁103，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

第四節 文化協會內的思想分歧與結社爭論

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誠如日本學者伊東昭雄所說：「不僅是台灣反日運動左右兩極的分裂，而且也是反日運動開始進入新階段的象徵事件」。這次事件，乃是台灣反日運動成熟後的一個必然結果。

在 1921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是林獻堂實踐他合法改革運動的具體行動之一。這個團體雖有其政治意義，但就其成立宗旨看來，文化協會的目標，主要是在提倡一個屬於台灣本土的獨立文化。也就是說，此一團體的存在，文化意義遠超過它的政治意義。也因為它是強調文化的，所以能夠包容從右翼到左翼的知識青年。自 1920 年初期以來，凡是關心台灣政治、文化前途的知識份子，幾乎都毫無例外的加入這個組織。從團體中的成員來觀察，文化協會可以說是一個反日聯合陣線的團體。但由於其右翼領導的特質及合法改革的訴求，加以台灣殖民地進入高度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島內社會結構重新調整，右翼領導者又無法提出新的政治主張，1925 年後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右翼領導者的訴求又難與農民運動相契合，這樣的「不動主義」引起新生代的不滿，當時文化協會中的左翼青年如連溫卿者，便認為台灣文化協會的右翼領導階層，已不足以適應日益高漲的社會動力。

1927 年，連溫卿主導了第一次的文化協會分裂，使得文化協會成為屬性偏向左翼的政治團體，而出走的成員蔣渭水及蔡培火組成了台灣民眾黨，與政治光譜已屬左翼的文化協會區別，其後蔣渭水因政治理念的轉變，與左翼政黨合作其聯合陣線的理想，使得蔡培火出走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這段轉變在下面將會敘述蔣渭水的政治理想變遷之因。1928 年，文化協會又因思想路線的爭議，台共黨員將連溫卿驅逐出文化協會，使文化協會完完全全成為台共的組織之一。兩次文化協會的分裂都左右了台灣左翼運動的發展情勢，與文化協會是否應採取合作同樣也成為台共內部黨員鬥爭的爭執點，探究文化協會的分裂之因及分析其存在背景，是研究台灣左翼歷史的重要主題。

在下表中筆者約略對 1920 年後的反日運動團體作出分類，由表中可以看出 1920 至 1928 年正是台灣反日運動團體蓬勃發展的時期，初期的政治團體是走合法改革的路線，以右翼屬性的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等人為代表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文化協會的宗旨除了以啟蒙台灣人的文化外，更發起台灣議會政治請願運動，冀

望能成立一個和日本政府對等的議會組織，為台灣人發聲；但由於台灣經濟情勢受到日本總督府的嚴重壓迫，勞農生活苦不堪言，加以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的成功，給於台灣的左翼運動運動者一個美好的希望。下表的政治團體屬性變遷及政黨的運動方向，便可說明台灣左翼運動的變遷歷史。

表 3-8 1920 年代台灣社會運動領導階層派系分流表

派別	思想傾向	社會運動路線	代表團體	代表人物	運動方向
右派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化的啟蒙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 1921.10.17	林獻堂、蔡惠如 蔣渭水、蔡培火 王敏川、林呈祿	台灣人的台灣 世界的台灣 日本的台灣 漢人的台灣
右派	民族主義派 【本土派】 【祖國派】 【日本派】	議會運動 合法的民族自決政治運動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0.8.17	林獻堂、蔡培火 楊肇嘉、蔡式毅 洪元煌、葉榮鐘 陳逢源、葉清耀	台灣人的台灣 漢人的台灣 日本的台灣
	全民主義派 【本土派】 【中國派】	全民運動 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並行	台灣民眾黨 1927.7.10	蔣渭水、謝春木 黃周、李應章 陳奇昌、彭華英 廖進平、黃旺成	台灣人的台灣 漢人的台灣
左派	社會主義派 【本土派】 【社會派】	階級鬥爭 農民運動、工人運動、 結合農工小資產階級的 階級鬥爭	新台灣文化協會 1927.1.3	連溫卿、王敏川 鄭明祿、吳石麟 林碧梧、楊貴 林冬貴、張信義	台灣人的台灣 世界的台灣
	共產主義派 【中國派】 【共產派】	階級鬥爭 改造文化協會為大眾黨	新台灣文化協會 1928.4.15	林木順、謝雪紅 翁澤生、潘欽信 葉孝乾、洪朝宗 林日高、莊春火	共產國際的台灣

※參見：資料來源引自：黃玉齋〈臺灣史百講〉頁 90~96，台北：台灣教育，1945 年；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16~217，台中市：台中市文化中心，1996 年。

一、連溫卿與反日左翼的分裂

連溫卿（1895-1957）台灣反日運動史上最受爭議的，但卻是被最少討論到的一位領導者，他受爭議的原因，因他的政治路線曾經導致文化協會先後兩次

分裂。他受到最少討論的原因，對於史學家對於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研究極其缺乏，從而對他的政治理念也不熟悉。連溫卿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者，並信奉勞農派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山川主義，並提倡世界語運動。連氏的思想在當時的台灣反日運動團體中顯得獨樹一格，但也因其思想及主張的艱澀，令他無法為其他的左翼團體所見容，對他於以無情的造謠及批判，使他黯然結束他的政治生命，後期雖有當時的參與者做出深刻的自我反省，使他的政治地位稍獲平反，而審視連溫卿三年的政治生命崛起及顛仆，恰巧說明殖民地抵抗運動的起伏升降，從這其中，不僅觀察到左翼運動的成敗，也考察到整個反日運動的得失。

左翼運動史的解釋權，一直掌握在台共成員的手中，有關左翼史的書籍也都出自台共的觀點。如蘇新的《憤怒的台灣》，稍晚如楊克煌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小史》，都是以有利台灣共產黨的立場來重建史實，有關文化協會的分裂，幾乎一面倒的把責任推給了連溫卿。而右翼史家對於左翼運動的態度也採取否定的態度²²，至1988年連氏手稿《台灣政治運動史》經由張炎憲、翁佳音的整理而出版，連氏在其中對於分裂的過程史實著墨甚多，與其他的左翼人士觀點有極大的歧異之處，但對於左翼運動的歷史，連氏的研究可以取得一個較為平衡的觀點。在左翼陣營裡，連溫卿被批判為「山川均反革命勞農派的私生子」與「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歷來的研究者對於這些指控都未能加以深入探討，以致忽略了左翼陣營分裂的真正原因

（一）左翼思潮的接觸

1. 參加世界語運動—

連溫卿，本名連嘴，1895年4月9日出生於台北市，他並未接受過完整的教育，而是透過自修的方式漸漸接觸左翼思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13年參加了世界人工語（Esperanto）運動，所謂的世界語，是以拉丁文為主體的人為制定語言。世界語普及運動希望穿越民族與宗教，能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後來兒玉源四郎來台，在台北自宅創立了日本世界語協會台灣支部。1913年，連氏加入了上述的協會支部，之後改名為台灣世界語協會。而後連氏擔任編輯的月刊雜誌《綠蔭（Verda Ombro）》發行，這本雜誌的發行期間為1919年至1931年，這個團體純粹是觀念性的團體，對世界語普及運動有很大的貢獻，其後作為單純

²² 如葉榮鐘：1971，就批評左翼運動者擅長搞分裂，連溫卿也連帶受到貶抑。

的文化活動而終結。

2. 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的結識－

1921年，由於參加世界語運動的關係，連溫卿認識了一位日本女性山口小靜，她的父親是台灣神社的宮司山口透，透過這個家族，連溫卿有機會認識了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山川均。1924年，他赴日本出席世界人工語大會，借住山川均家，兩人過從甚密的緣故，連溫卿在思想上頗受山川均的影響。她也提供台灣社會的一些資料與數據給山川均。山川均在1926年發表〈殖民政治下の台灣〉，便是獲得連溫卿的協助。（戴國輝，1999，57~60）。受山川主義影響的連氏回到台灣後，向台灣人推薦日本共產黨發刊的《無產者新聞》和《前進》等報紙，推廣山川主義等勞農派共產主義的思想。

（二）連溫卿與1927年的文協分裂

1. 文協左翼的濫觴－

台灣文化協會在1921年成立之初，連溫卿便是其中一位發起人。誠如他所說的：「台灣文化協會之成立，是在喚起反日本帝國之意識；不消說，反對日本帝國之意識，是先以反對日本資本的意識為出發的。這意識的普遍與發展終使台灣的階級崛起」（連溫卿，1953：69）。他將文協定位為「反對日本資本的意識」時，就寓有反資本家、反資本主義的意味，當然也與他在二〇年代與山川均的接觸有關。1923年，在文化協會內部，他與謝文達、蔣渭水、石煥長、蔡式毅等五人，發起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主張「就社會組織的缺陷引發之各種問題，在同仁間研究適當的解決方法。」²³文化協會左翼路線的形成，當以此為濫觴。同一時期，連溫卿也在文協外面參加翁澤生等人所組成的台北青年會，這是以推展青年學生運動為主旨的團體。²⁴

2. 文協成員派別的分歧－

（1）思想路線的分歧

根據日本官方的觀察，到了1924年後文協成員基本上分成三派，亦即連溫卿所代表的共產主義派、蔣渭水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影響勢力派，以及蔡培火所主張的台灣民族運動派。雖然分法略嫌粗糙，但已觸及了文協在日後發生內訌的重要原

²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日本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一（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此書又稱為《台灣警察沿革誌》，中譯本為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總策畫，《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台北：創造，1989），頁246。

²⁴ 翁澤生的生平與參加政治運動的事實，參閱陳芳明，1998：99-124。

因。但詳細深究，連溫卿應不能歸類為「共產主義派」，而應該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蔣渭水的思想雖趨近社會主義，但他未能全部克服資本階級傾向的立場。他的政治主張，較勁於跨越階級路線的全民革命思考，因此應將他歸於「折衷派」；而蔡培火則是極端的保守派，他被歸類為「合法民族運動派」，則為允當。

(2) 蔣渭水與蔡培火的出走

連溫卿的社會主義信仰，促使他奪走了文化協會的領導權，使這個原屬於聯合陣線的文化團體走上左傾的道路。蔣渭水在文協領導權落入連溫卿手中後，在1927年與蔡培火雙雙退出，另組中間偏左的台灣民眾黨。蔡培火則等到1929年，發現蔣渭水的思想已極具左傾色彩，遂又退出台灣民眾黨，而與楊肇嘉、葉榮鐘等人重組極右路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這些意識形態的對立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整個殖民地社會的環境所造就出來的。

(3) 堅持「階級路線」的主張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1929年對台灣的反日運動提出這樣的觀察：「台灣階級運動，必然具有應帶民族運動性的社會的理由。」他指出，資本家或巨型現代產業，都是在日本人的獨占勢力之下；而台灣的階級中，並不純粹是無產階級。要走純階級鬥爭的路線，必然要排斥其他不符階級路線的運動者。他又指出，台灣民族資本家與一些中產階級，基本上是同情農民與工人的。因此，他說：「台灣的階級運動，一方面是以其殖民的事情為基礎，同時又帶有民族運動的性格。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台灣的民族運動袋有階級運動的性格。」(矢內原忠雄, 1987: 182~183) 矢內原忠雄強調當時台灣的反殖民運動應該是屬於全民革命的性質，並部署於階級革命的範疇。因為，他注意到台灣是屬於殖民地社會，內部的每一個階級都受到強弱不等的壓迫。

但連溫卿在受到山川主義的影響後，對於階級路線的主張極為堅持。山川主義的主要重點在於，日本資本主義尚未成熟，對於革命形勢還不是很有利；因此，共產黨這種激進的組織還不能以「合法」的姿態出現。他主張共產黨應該解散。山川均認為，無產階級意識是隨著革命情勢的成熟而成長，因此應該使其自然發生，而不是以宣傳的方式助其發生。他進一步指出，不能把列寧主義毫無選擇的套在日本社會裡。日本應該發展適合於本身社會條件的革命路線，而不是盲目聽

從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²⁵連溫卿在文協分裂後，發表了名為「一九二七年之台灣」的論文，其中有以下之敘述：「想要解放被壓榨的台灣人民的話，有實行階級鬥爭的必要²⁶」。如此，連氏對台灣社會改造路線的看法從此確立，雖然文協隨後分裂，此一思想仍成為 1920 年代社會主義思想的代表，而將文協的階級路線轉向成以農民、工人為主導的路線，也成為連溫卿的實踐對象。

3. 「中國改造論」的論戰

台灣反日運動到了 1926 年誕生台灣農民組合的團體後，就開始注入階級的色彩。台灣文化協會能否勝任形勢下的政治任務，便面臨了嚴重的考驗。而文協與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互動關係，也是知識份子最為關注的的議題之一，具體的表現於 1927 年初，發生於文協機關刊物《台灣民報》上的「中國改造論」論戰。²⁷「中國改造論」的論戰，預告了反日政治運動路線的分裂。在這個問題上，連溫卿扮演了主導的角色，他在當年八月提出〈台灣社會運動概觀〉一文，清楚表示了他對階級路線的支持，他說：

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急忙成長起來，遂見有兩個潮流的對峙，先是為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但三個月前，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還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一是主張，台灣雖沒有所謂的資本家，那自然就沒有資本主

²⁵ 山川主義內容討論，係參閱史明，1998：565。

²⁶ 連溫卿，〈台灣社會運動概觀〉，《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年5月7日），頁15。

²⁷ 中國改造論是指陳逢源（芳園）與許乃昌（沫雲）在《台灣民報》上有關資本主義的論戰。陳逢源（《民報》記者，文協理事）在 1926 年 8.29 發表〈我的中國改造論〉，主張中國社會目前大部分仍在封建制度之下，中國的社會組織還味精資本主義的洗禮，所以一下子跳到向蘇俄一樣的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而許乃昌則立即反駁他的論點，先指責陳逢源弄不通馬克思主義，接著指出中國的社會是帝國主義下的中間制度，將來為有朝向「xx（共產）主義制度」。且目前中國有產積極還相當反動，為有無產階級殘能擔負改造中國的歷史任務。所以，許乃昌主張無產階級的利益。陳逢源又在《台灣民報》上連續發表八次的反駁，指出中國的燃眉之急是對外恢復國權，對內統一國家；在經濟上是走資本主義，以積蓄國內資本，發揮實業家個人的組織能力，並使國家採取徹底的社會政策。值於在中國的國民主義（Nationalism）成功以前，要先指阻礙國民運動的超國家思想的共產主義置一邊，後日再論。見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 120 號（1926 年 8 月 29 日），頁 8-10；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 126-129 號（1926 年 10 月 10 日、17 日、24 日及 31 日），頁 10-13、頁 10-12、頁 9-11、頁 10；芳園（陳逢源），〈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一至八），《台灣民報》第 130-133 號、135-137 號、139 號（1926 年 11 月 7 日、14 日、21 日、28 日、12 月 12 日、19 日、26 日、1 月 9 日），頁 2-3、頁 10-11、頁 11-12、頁 8-9、頁 11、頁 11-12、頁 12-13；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台灣民報》第 134 號（1926 年 12 月 5 日），頁 10-13；許乃昌，〈給陳逢源的公開狀〉（上）（下），《台灣民報》第 142-143 號（1927 年 1 月 31 日、2 月 6 日）頁 11-12、頁 11-14。見吳密察：1992。

義的存在，所以台灣要豫先使台灣人的資本家發達起來，能夠到達和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位，才是合理的，欲著到這個目的，須要以民族運動去進行的，他的主張，和這個主張，卻是相反，台灣雖有資本家也沒有發展到能夠獨立的地步，因為再台灣的資本主義，已經鞏固了地盤的緣故，而被壓迫、榨取的台灣人，不是祇限於少數資本家及地主而已，此外還有大多數的勞動者及農民的存在，所以欲解放台灣人，應該要主張階級爭鬥，前者的主張是因為以少數的利害關係為根本的要求，所以能和當局所標榜的「內地延長主義」一致，其界線難以獲得政治上的獨立為止，換句話說，是以他們所主張的「台灣議會」設置為其極限，而後者的主張是以最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所以不同的是當然結果，而互相駁擊也是脫不難的，因為無產農民、及勞動者的利害關係不能和那少數地主、資本家的一致的緣故。

因為有這兩個潮流磅礴了台灣，遂給台灣文化協會釀成分裂的動機，而使民族主義者總退卻，及結成了勞力組織者「台灣民眾黨」，以和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自是以後，從來少數者的運動，即變做大眾的運動。（連溫卿，1928：15~16）

（三）臺共為奪取領導權的批判

轉向後的新文協其領導的社會運動已確立在階級路線之上，但連溫卿在新文協內並未占有實際的地位，從下列的分配位置就可看出：

表 3-9 文協第一次分裂後的職務分配表

	主務	部員
組織部	王敏川	洪石柱 林冬桂 連溫卿
教育部	林碧梧	王敏川 邱德金 連溫卿
宣傳部	鄭明祿	張信義 高兩貴
庶務部	林冬桂	吳石麟 鄭明祿
會計部	張信義	林碧梧
婦女部	黃氏細娥	

*資料來源：引自陳芳明〈連溫卿與反日左翼的分裂—台灣反殖民史的一個考察〉，頁 276，台北：麥田，2004 年。

從這樣的任務編組可以發現，新文協的實際領導人是王敏川，然而王敏川與連溫

卿在工會運動的議題上發生衝突，造成新文協再度分裂的因素²⁸。王敏川的「台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傾向把左、右工會結盟起來，而這樣的主張和當時台共的聯合路線政策是相合的，台共當時急於利用文化協會這個合法的組織掩護其非法的抗爭運動，為了奪取文協的領導權，台共指稱連溫卿策略的左傾路線過於激烈；再加以連溫卿具有介入運動的實際經驗，他在農民運動方面主動與台灣農民組合結盟，工人運動上，他也獨立在北部發展，頗具影響力。而這也正式台共最引以為憂，因為一旦農工的主導權不能奪得，就不可能發揮黨的力量。

而為了打擊連溫卿，台共主席林木順在1928年8月寫了一份〈台灣農民對策〉，指控連是「逃避主義者」、「投機主義者」²⁹，這篇文章確立了連溫卿與楊貴為台共鬥爭的假想敵，也成功分化了農民組合的簡吉入黨(台共)。1929年，林木順再次撰文，正式把連溫卿稱為「是當今台灣左翼指導者的代表，他的解黨主義，是山川主義在台灣不折不扣的私生子」，台共對連的指控，在「福本主義」與「山川主義」隨意妄加於連身上，可見台共奪權之心切。

台共分化了農組之後，又接著挑戰新文協的工會領導權，連溫卿的遭忌，固然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連溫卿準備成立「台灣總工會」。「台灣總工會」的構想，與台共籌畫中的「台灣赤色總工會」發生了衝突。所以台共抨擊連溫卿，完全是領導權的問題，台共加在他身上的思想路線罪名，可說是莫須有的。1929年11月3日，新文協的全島代表舉行第三次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便是如何著手把連溫卿除名。在大會上，出現了一份給出席代表的傳單，題為〈關於排擊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派，向代表諸位致檄〉。這篇檄文，指控連溫卿派的人士洩漏組織機密，擾亂農民組合的重整，企圖搞內部分裂等等。這份檄文是以「台灣農民組成本部」的名義發出的，並在會後，將連溫卿一派人士除名。連溫卿等人被驅逐之後，文化協會的領導權便落入台共手中

²⁸ 連溫卿認為社會運動應該採取全島統一戰略。1928年5月20日，新文協以全島工友會代表大會籌備處之名義，把討論台灣總工會的組織的議案發給了全島左翼團體。為了名稱問題，緊張關係立即產生，連溫卿主張「台灣總工會」，王敏川則主張「台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北部工人代表支持連派，中南部的代表則傾向王派。雙方僵持不下之際，連溫卿因台南墓地事件遭到檢舉，兩派的爭議暫告平息。

²⁹ 林木順抨擊連：「連派乃是根本反對民族鬥爭，這是因為他們對台灣民族革命沒有理解，完全無視台灣客觀的形勢發展，此乃他們最大的謬誤。共產國際規定，在殖民地，共產黨最重要的初步任務，乃是動員勞農大眾打倒帝國主義，為民族獨立而鬥爭。連派由於反對共產主義的緣故，當然對此任務無法理解。台灣革命的現階段鬥爭目標，便是獨立運動，打倒帝國主義，建設大多數的民主共和國的勞農獨裁制。」林木順，〈農民問題對策〉，收入山邊健太郎編，現代史資料22），161-162。關於林木順對連溫卿的抨擊，可參閱陳芳明，1998：47~98。

了，等到完全控制文協後，台共成員便開始面臨內部權力鬥爭與運動觀點的爭議。到 1929 年年底為止，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已經變成台共的外圍組織，在台共之外，其他較為重要的政治團體，只剩下右翼的台灣民眾黨。而民眾黨內部已瀕臨分裂的邊緣，到了 1930 年，林獻堂、蔡培火、葉榮鐘、蔡式毅等人，就以蔣渭水左傾為由，退出民眾黨，另外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四）臺共成員對連溫卿除名事件的反省

1. 連溫卿對自己立場的辯護

連溫卿在戰後受台北市文獻會之邀撰寫《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完成於 1952 年，亦即後來《台灣政治運動史》的張本³⁰。他對於台共之奪權陰謀，瞭若指掌。在書中，他以「上大派」來影射台共。書中談到當年台灣總工會籌組之際，台共的運作與背後動機如下：

當時上大派已經會議討論，企圖藉此機會獲得勞動運動之指導權。彼等思若贊同總工會之立即組成論，恐怕不能獲得勞動運動之指導權，加以台灣農民組合幹部亦以台灣有特殊事情，已公然主張它應有社會運動之指導權，故若贊同總工會之立即組成論，欲獲得勞動運動之指導權可謂等於無。「上大派」亦以該會為細胞組織之據點，若能以此企圖而獲得成功，則全島之政治、社會、勞動經濟諸運動指導權之獲得並非不可能，此種事實愈使總工會之竭誠不得不延緩下去。其始對此態度尚屬消極，其後則漸趨積極，終發展至於文化改組（按：指新文協）後之對連、李除名。（連溫卿，1988：187）

而對於文協的分裂再分裂，他在第一篇文章中的結語部分，有極其精闢的見解，既指出台灣反日運動的弱點，也同時為自己的政治立場辯護：

正如其他各民族運動一樣，台灣初期運動的領導人都出自大資產階級，他們當時雖說是自己帶頭行動，實際上，是被知識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押送到前線，依此說法，在 1921 年所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宣稱拿生命做賭注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一經統治階級施予經濟壓迫，遂自行退縮了，變成不活躍的運動。保守的他們認為激進的小資產階級與學生對付統治階級「過激」，然後，又對大眾之間所展開的潮流深感威脅，因而妨害群眾運動，咒詛階級鬥爭，從而在 1927 年醞釀在組織新的民眾黨，包括富裕階層的小資產階級與民族主義者，現在，台灣

³⁰ 連溫卿這手稿被發現的曲折經過，頗具傳奇性。參樂張炎憲、翁佳音，〈撥雲見日又一聲一代序〉，收入連溫卿著，1988：1-10。

自治促進聯盟的再分裂其實已種根於當時。如矢內原忠雄和後藤貞治等，判定文協的分裂是起於連溫卿陰謀利用二十名無產青年所致，民眾黨此種自圓其說的宣傳，被當局所引用，取代了事實的真相。此間，鄭楚於創造歷史的開端，席捲全島的農民運動，自以為是社會運動的指導團體，已不民主的方式選舉代表前往日本內地，造成了今日內部對立衝突的狀態。雖然表面上分裂後的文協與民眾黨對立著，但是程式樓公已經如狂飆似地成長起來，在統治階級與大資產階級感到威脅之瞬間，激進的小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者也同感威脅。現在，兩者還繼續位領導權而明爭暗鬥，意識上，使得左翼工會的組成怠慢下來，失去它的支持。雖然如此，台灣無產階級由先進的被壓迫民族運動吸取教訓－就是從日本殖民政策、帝國主義的榨取下，掙得完全的自由。³¹

2. 台共成員對鬥爭連的反省

當年也參加對新文協鬥爭的臺共黨員蘇新，晚年對連溫卿的除名事件有一番自我反省。他認為在新文協的第二次分裂中，不應該使用「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社會民主主義」或是「馬克思主義」來進行所謂的理論鬥爭，因為新文協畢竟不是政黨。他又指出：「開除連溫卿一派的做法是輕率的，理由也不充分。當時，文協幹部和農組幹部以『密探』、『內奸』這樣的罪名開除連溫卿，如果證據確鑿，罪有應得。……但是如果沒有事實根據，對於連溫卿說來，是一項莫大的侮辱，而且在歷史上留下永遠洗不清的汙點。」（蘇新，1993：100~106）

二、蔣渭水晚期對無產路線的認同

蔣渭水在台灣反日動所扮演的角色，對右翼運動者來說，他似乎過於左傾；而對左翼運動者而言，他又似乎帶點小資產階級的色彩。但將蔣渭水後期政治思想路線與他初期作為對照，與謝雪紅在政治團體聯合陣線的合作，是他政治路線的大轉折，而後來的學者也以此作為探討其政治路線改變的關鍵。關於蔣渭水晚期政治思想歸向的「左」、「右」，似乎成為反日歷史中一個難解的謎題！

（一）籌組台灣民眾黨

1927年，文化協會的連溫卿主張階級鬥爭路線，獲得文協的領導權，與蔡培火兩人另組台灣民眾黨，那時蔣渭水對於連溫卿堅持山川主義「階級鬥爭」路線革命非常的不以為然。在1927年5月1日的《台灣民報》社論上，就以〈以

³¹ 此文有中文譯本，參閱連溫卿：1981。

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為題，主張「帝國主義國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應取階級鬥爭；在帝國主義國內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應採取民族運動—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更指出「現在的中國，就是採用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而指責左派主張階級鬥爭是錯誤的，這是「自欺欺人，太無視台灣的現實情境了」《台灣民報》（1927.5.1，第155號）接著提出一篇〈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指出孫中山與越飛的聯合宣言，孫中山已判斷共產組織不合中國今日之用，而何況於台灣呢？所謂弱小民族的階級鬥爭無異民族的自殺，當局以為台灣人若採取階級鬥爭，則台灣人自身必要分裂，分裂為有產與無產—則互相殘殺，骨肉相爭，勢力分散，故當局容易統治。

從上面兩篇文章可以看出蔣渭水企望反日團體能夠相互合作，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互相攻擊，只是讓日本殖民者更加容易統治而已。1927年1月2日，蔣渭水在「台灣工友總聯盟」的第一次大會上疾呼「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台灣民報》（1927.1.2，第138號），更可看出蔣渭水冀望反日團體能夠真正的團結。蔣渭水他的聯合主張也受到了台共謝雪紅的注意，台共也希望能藉者台灣工友總聯盟的力量，拓展台共成員的勢力。

（二）與謝雪紅的「聯合陣線」合作

台共成員秉持著無產階級路線的思想，也批評了民眾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論調以及領導者作為，可是卻不得不承認其所掌控的右派「台灣工友總聯盟」在組織工會運動裏深具聲望。謝雪紅為了培植台共在工人組織方面的影響力，和楊克培主動引介陳其昌給蔣渭水，期望陳其昌能在黨內獲取影響力³²，陳其昌與蔣渭水經過三天三夜的長談之後，陳其昌深得蔣的欣賞而被允許加入民眾黨，而且在蔣渭水的特別推薦下，陳其昌最後擔任民眾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幹」³³。

根據學者簡炯仁向曾得志、張晴川、陳其昌所做的訪談紀錄說明，蔣渭水由於長期的與陳其昌交換革命意見以及當時台灣發生的社會事件影響下，蔣渭水

³² 陳奇昌曾與謝雪紅和林木順一起在上海大學唸書。「五卅慘案」時，陳遠到武漢參加當地的工人運動。1926年，他與謝雪紅、林木順一起被中共推薦到莫斯科進修。然而，因「私人的理由」，他在上海碼頭與謝、林揮別，獨自前往日本。抵日之後，他隨即進入日本大學就讀，並與在日的台灣激進學生和日本激進份子保持密切聯繫，1929年返台後，他隨即依附於謝雪紅和楊克培的派系。參閱簡炯仁：199，102。

³³ 《台灣民報》，（1929.9.8）第277期。在蔣渭水的大力支持下，陳其昌得以取代王鐘麟，擔任民眾黨的主幹。王是以健康的理由請辭，並遠赴中國旅遊。訪談張晴川所得（1975.11.6）參閱簡炯仁：1997，109。

便逐漸左傾³⁴。穩健派的蔡培火、蔡式毅、陳逢源等人聯絡楊肇嘉，另謀「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準備。1929年10月17日，民眾黨召開第三次黨員大會，蔣渭水在大會報告上，便強調今後台灣革命的主力為農工階級。

隨者黨內中產階級、地主的離異，蔣渭水在1930年1月7日中常會上準備修改黨綱為（1）解除政治經濟社會的束縛；（2）擁護民眾的利益；（3）反對總督專制。但遭到當局的警告而中止。這一年的12月28日，在向中常會提出〈綱領修正案〉，獲中常會通過，修改案為：

【綱領】

- （1）爭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政治自由
- （2）擁護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日常利益
- （3）努力擴大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組織

民眾黨至此，可說已經完全「左傾」，明確表明為「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為奮鬥的目標。

1931年2月18日，蔣渭水召開第四次大會，蔣渭水改組民眾黨，成為一個擁護馬列主義的激進左派政黨，民眾黨也矢志爭取工人、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的人民的自由。但不久大會被日本當局所禁止，勒令民眾黨解散。之後，蔣渭水一直與共產黨人保持聯繫。1931年8月5日，蔣渭水病逝於臺大醫院，他的遺囑說：

「台灣的社會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

此句話引申於他的工友總聯盟成立宣言，該篇題名為「台灣工友總聯盟的指導原則」。蔣渭水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應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經濟鬥爭，也就是工會主義；第二階段，是經濟與政治的鬥爭；第三階段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與無產階級專政。他特別強調，同屬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一環的台灣民族運動，其解放階段也不例外。

蔣渭水的思想轉變，並非一朝一夕的，對於其思想的「左」、「右」爭辯，也一直有學者提出他們的看法，但就筆者認為，蔣渭水的政治思想雖然提及

³⁴ 簡炯仁訪談曾得志、張晴川、陳其昌所得。陳說：「自從我接任主幹以後，民眾黨的黨路線（已開始）強調階級鬥爭，以順應時勢演變。蔣渭水的政治思想傾向於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而且注重社會主義。換句話來說，蔣的政治思想接近於1927年寧漢分裂時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但是，當黨涉入勞工運動愈深之後，蔣就愈傾向於馬列主義。」參閱簡炯仁，1997：109。

「無階級」，但其運動路線的實踐並非能算是純粹的「左翼」，而蔣渭水與謝雪紅的「聯合陣線」合作模式，就其他們合作的真正意義，都是希望能將反日團體力量結合起來，才能維護台灣人民的利益；但若選擇單獨作戰對抗殖民體制，也只會使反日團體的力量被分崩的支離破碎而已。